

中國未來三十年

2009-2039

1979-2009

1949-1979

周牧之
楊偉民
主編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

中國未來三十年

周牧之 楊偉民 主編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

責任編輯 姚沙沙、楊帆

特邀編輯 海 帆

書籍設計 吳冠曼

叢書名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

書名 中國未來三十年

主編 周牧之 楊偉民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 1304 室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香港九龍塘聯福道 34 號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刷 宏亞印務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豐業街 8 號 13 樓

版次 2011 年 2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16 開（168 × 230 mm）472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038-1

© 2011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序 變局的世界與變革的中國

周牧之

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轟然倒塌，世界格局驟變，全球化成為世界經濟的主旋律。20年來，全球GDP從20萬億美元猛增至60萬億美元，人類步入一個空前的成長和變化的時代。它比500年前大航海帶來的大變局來得更猛，比200年前產業革命帶來的大變局來得更烈，可以說是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巨變。

一、三大革命與格局劇變

IT革命、低碳革命和全球化的三大革命正在塗改人類的生產、消費和生活模式。

在生產上，企業衝出國界走向全球，更加全面地依靠全球供應鏈在世界範圍內追求最合理的生產和銷售。產業發展模式更是從滿足市場需求轉變成創造市場需求。在消費上，人們越來越習慣於通過互聯網全球採購信息和物品。以百貨店、超市和便民店為代表的傳統零售業跌入冰河，相反，網絡銷售量一路飆升。報刊、雜誌、書籍、DVD / CD的銷量急劇萎縮，在線閱讀、在線音視等新生態正在瘋長。

新產業不斷橫空出世，傳統產業也正在經歷變革的陣痛。從最大的傳統產業——汽車產業的風雲突變可以窺視到大變革之一斑。曾經是美國繁榮象徵的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相繼破產，日本第一大企業豐田汽車深陷「召回門」，全

球眾多的汽車巨鱷大多經營窘迫。究其原因，並不單是企業經營不善和金融危機下的市場大縮水，而且是全球汽車業正在經歷一場由電動化、全球配套化和IT化引發的「三化」大變革。

1·電動化

所謂電動化是指汽車從燃油發動機向電動馬達的轉型，每台汽車需要的零部件將從大約3萬點銳減到2萬點，這意味着大批與發動機相關的零部件供應商將被蒸發，相反與電池和電動馬達相關的廠商可以大展宏圖，更重要的是汽車大鱷們的產能規模突然變臉成阻礙轉型的包袱。最近電動汽車的風雲角色大都是擁有電池等核心技術又沒有歷史包袱的後起之秀，比如中國比亞迪的異軍突起，特斯拉（Tesla）等美國製造商的生猛騰挪。與傳統汽車廠商動輒擁有幾萬到幾十萬員工相比，這些電動汽車黑馬多屬輕裝上陣，有的只有幾百上千人，許多過去甚至不生產汽車，完全是一批「另類」的挑戰者。

2·全球配套化

全球各大汽車巨子過去都各自擁有數以千計的以資本關係、歷史淵源和地緣維繫的配套廠。但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汽車廠商正在構築開放型的全球配套商業模式。為謀求生存，零部件廠商也正在從供應特定汽車廠走向為更多廠商提供產品，整個汽車產業的配套和協作正在向開放型模式大轉型。

3·IT化

IT化更是將汽車嬗變成會行走的「IT大機器」。用於通信和控制的車載半導體的成本今天已經佔到每輛汽車銷售價格的5%左右，預計在不久的將來這個比例將會達到20%。主導汽車產業發展的技術已經由機械技術讓位於IT和能源技術，研發、生產和銷售資源更是在全球範圍內進行重新組合，整個產業生

態正在大更替。

從汽車產業的劇變可以看到在IT革命、全球化、低碳革命三大浪潮推動下，全球所有的產業都在經歷大洗牌。中國正是在這一大變局中順應世界潮流，迅猛崛起，躍進為新的世界工廠。

二、繁榮的要義和消長的變遷

世界格局劇變不僅改變了企業形態和產業生態，還改變了城市和國家的繁榮條件。改革、創業和開放成為新時代締造繁榮的三大要義。中、日、美三國在過去20年的消長盈缺正是對三大要義的絕妙註釋。

1·銳意改革

謀求新格局下的發展，首先必須改革舊的遊戲規則，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在計劃經濟的困局和改革開放初期的摸索中迎來時代轉折的中國，徹底訣別計劃經濟，果斷實施經濟體制改革，迎合世界新潮流，實現了爆發性的發展，20年來按人民幣計算的GDP陡增20倍（按美元計算增長了11倍），成就驕然。

美國在西海岸開闢了以硅谷為代表的，與舊勢力、舊秩序性質截然不同的IT革命根據地，締造了新經濟、新繁榮。

反觀在泡沫經濟巔峰期迎來柏林牆崩塌的日本，難以忘懷舊時代的輝煌，不肯放棄過去的成功模式，無論是在國政還是在企業形態上都沒有真正找到再造繁榮的方略。在全球大發展的時代，經濟規模20年幾乎沒有變化，戰後第一個東亞奇跡的創造者從冷戰時期的寵兒跌落成全球化時代的徘徊者。

2·創業創新

新時代打造繁榮的第二要義是需要以旺盛的創新精神開創新的商業模式和新的企業形態，應對三大革命。在這一變化的時代，最重要的創新是商業模式的創新，創業是創新商業模式的最佳途徑。

在中國，今天支撐經濟大國之路的企業在20年前大多還不存在，或者弱小得可以忽略。正是按捺不住的創業衝動締造出來的千千萬萬新生企業，複合成今天中國大發展的動力。

在美國西海岸的硅谷，無數工程師的創業衝動把冷戰時期美國的科技儲備和IT火種演變成新生活方式、新需求和新產業，蘋果、谷歌、雅虎、亞馬遜、易趣、Facebook……層出不窮的新興企業，主導了IT革命新潮。

相反在日本，20年來沒有催生出一家能在全球引領風騷的新企業。IT業界依然是日立、索尼、松下、東芝、三菱、夏普等前IT時代的老店聯手遮天。日本政府和企业雖然極其重視研究開發，投入甚巨，近年諾貝爾獎連連摘冠也標誌該國已經走出改良型技術發展模式，其基礎科學領域成就正在逐漸被世界承認。然而產業巨鱷們卻大都表現欠佳，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下更是陷入「赤字大合唱」。應該說，是戰後蔓延的工薪社會風潮吞噬了日本的創業衝動，窒息了把技術創新演變成爲創業的社會活力，導致無數先進的技術和產品胎死腹中。

3·開放國門

開放是在全球化時代營造繁榮的另一要義。誰能為全球英才提供創業、創新平台，誰就能夠成為坐地分紅的莊主。在全球化時代成功的國家和地區都把立國之本定位在為全球企業和精英提供創新、創業平台。中國正是開放了國門，向全球企業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成就了自身的大發展。

美國硅谷在這一點上堪稱經典，正是大批來自中國、印度、歐洲的尋夢者們的創意和創業在短短幾十年內把一片荒涼之地打造成IT革命的童話世

界。美國大學的聚才功績也堪稱卓越，多達67萬的在校留學生為該國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外來人才和創意，今天外國出身者已佔到在美國獲取工程博士者的半數以上。

在這一方面，日本遠落伍於時代。講究以心傳心的封閉文化致使日本企業即便在國外安營紮寨也大都以日本人把守核心高層，最終造成以一國之才對抗全球精英的局面，其結果可想而知。

新時代的創新和創業來源於人與人的交流和碰撞。開放、寬容、便捷和魅力是吸引全球英才們往來、學習、工作、居住的前提。同時，提供交流平台也給城市帶來新時代的發展機會。為促進不同背景人們的交往，打造開放的魅力城市之努力不可或缺。

三、危機與改革

2008年華爾街引爆的金融危機加速了大變局和繁榮的更替。2009年是歷史上中國最受世界關注的一年，超過8%的經濟增長為灰暗歲月裡的世界經濟造就了新的引擎。中國的國際地位驟然上升，美國甚至有人提出由中美共治世界的G2設想。鴉片戰爭後經歷了170年的苦難磨礪，黃色巨龍終於得以翻身。

危機使人渴望變革。危機下追求變革的大眾心態造就了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和戰後日本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政權交替。

但震源華爾街的改造卻遠還沒有到位，一些金融機構甚至一邊接受政府救濟，一邊大發獎金。針對把垃圾打包當成寶貝賣的投機遊戲，美國政府也還沒有更改重大的遊戲規則和監管機制，孕育危機的土壤並沒有清除，另一輪的金融風暴可能再來。

金融危機下，西方各國的財政赤字和國家債務更是急劇惡化，日本、意

大利、美國、德國的國家債務對GDP的比例已經分別高達218.6%、115.8%、84.8%、78.7%。希臘債務危機給無節制的國家舉債敲響了警鐘，但上述國家還看不到改善財政狀況的端倪，債務危機隨時都可能引爆世界性的經濟大波動。

在全球經濟危機的風暴中，出口急劇縮水在中國也導致大批企業倒閉、大量農民工失業。究其原因，一是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出口市場，美國的驟變把中國經濟瞬間拖入冰河；二是長期謳歌經濟發展造成對政治、社會改革的怠慢，體制缺陷嚴重地制約了應對危機衝擊的承受能力。

依靠政府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財政和寬鬆的金融政策，中國雖然維持了高速增長，但橫亙在面前的困難如山：出口受挫、貧富差距、資產泡沫、環境污染……未來西方各國債務的進一步惡化、美元的暴跌和新一輪金融危機的爆發都可能撼動中國經濟。

在全球房市、股市一片叫跌聲中，中國房市、股市的狂漲顯現中國經濟的新局面。這種奇特現象不僅源於過分寬鬆的金融放貸和在房地產領域制約機制缺位，更有國內外投機游資的興風作浪。曾經使美國金融政策失效，格林斯潘稱之為「謎（conundrum）」而無從應對的國際游資，已經開始困擾中國的經濟運營。

潛伏在發展模式中的問題凸顯出來。改革開放後30年中國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分配的不均衡與再分配體制的欠缺卻加劇了中國社會的分裂和對立。

過去30年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勞動分配率的低下，農民和普通勞動者，特別是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的收入和福利長期處於極低的水平。分配的不均衡使龐大的農民和勞動者群體沒有充分享受到高速經濟增長的成果，內需市場的成長也因此受到遏制。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另一重大問題是缺乏再分配機制。從社會群體來看，收入增長較快的群體和收入增長緩慢，甚至收入減少的群體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從地區差距來看，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謳歌大

發展相比，許多內陸地區產業欠缺活力，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衰退的現象，地區差距越拉越大。

缺乏再分配機制下的高速經濟增長，造成享受到和沒有分享到成長果實的群體之間的社會分化日益擴大，引發了高度的社會緊張。

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30年，中國在強敵環視之下，憑藉計劃經濟總動員，自力更生地實現了初步的重工業化，確立了捍衛獨立和尊嚴的基本實力。但是長期犧牲國民生活水準和農民利益的工業化路線，以及頻繁的政治運動導致經濟活力喪失殆盡，特別是人民公社化的農村經濟瀕於崩潰。

第二個30年，改革開放釋放封存已久的活力，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打造出一個新興貿易大國和經濟大國。然而，重工業化路線遺留下的二元社會結構並沒有被清算，戶籍制度吞噬了億萬農民工在城市的權益，低勞動分配率和再分配機制缺位更把中國從一個平等、平均的社會在極短的時間內分化成溝壑叢生的階層社會。

今天的中國，高速經濟發展與高度社會緊張並存，社會緊張的增幅正在威脅中國社會的安定與發展。與30年前站在改革開放的十字路口一樣，今天的中國再一次站在歷史性的變革關頭。在未來的30年，中國必須從根本上改變發展模式，變革社會機制，改革社會結構，以全新的姿態創造全民共享的繁榮，引領全球經濟發展。為此，需要着力改善收入分配機制、改革戶籍制度、強化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制，需要將高能耗、高污染發展轉化為綠色、低碳發展，還需要將弱元（人民幣）/出口依賴型經濟打造成強元/內需主導型經濟……

1·轉換發展目標

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30年，由於長期身處嚴峻的國際環境，中國不得不將擴大工業生產力作為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目標，全力推進重工業化。為此政府一直採取了要求國民以貢獻和犧牲支持工業化的政策，特別是剝奪了農民在城

市就業和居住以及與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權利，形成了極度限制農民權益的社會結構。

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中國經濟的規模和實力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然而限制農民權益的社會結構卻一直延續至今。中國雖然為追求擴大生產力實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對社會結構的改革卻還剛剛起步。

今天的中國亟待從根本上改革重工業化時代遺留下來的二元化社會結構，將社會發展的目標從擴大生產力轉變到建設發展成果全民共享的和諧社會上來。

2·實現內需型經濟發展

改革開放後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使一個經濟貿易大國橫空出世。過去物資極度匱乏，靠農副產品苦掙外匯的中國今天被海外譽為「世界工廠」。然而過分依賴出口的增長模式使中國與歐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愈演愈烈。不斷擴大的貿易不平衡已經成為美國和歐洲各國指責中國的口實，中國在人民幣升值、金融市場開放、擴大進口等問題上的壓力越來越大。

中國擴大內需市場的關鍵是如何增加被成長疏遠人群的收入水平。為此，首先需要通過城市化將勞動力從勞動生產率較低的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服務業等勞動生產率較高的部門。同時必須提高工業、服務業等部門的勞動分配率，促進普通勞動者收入的提高。

在中國，一方面存在着嚴重的內需不足，另一方面卻存在着有需求但是供應不足，甚至沒有供應的領域，這種領域集中在第三產業。因此通過發展第三產業推動擴大內需的潛力非常大。

第三產業的發展首先需要打破壟斷。特別是在壟斷傾向較強的金融、運輸、通訊、文化、傳媒和網絡等領域，如果不打破壟斷狀態，不可能有第三產業大發展的局面。

服務產業的發展還需要緩和管制。政府需要將文化和大眾傳媒作為產業看

待，緩和對這些領域的管制。中國需要給這些極具前途的產業開放更多的發展空間。

3· 構建再分配體制

中國現在面臨的另一個重大問題是如何實現經濟發展成果的公平分配，將經濟發展的實惠分配到所有的階層和地區。如果能夠成功地解決分配問題，中國經濟將會順利地實現由出口主導型向內需主導型的轉變，實現長期安定的發展。相反，如果這一問題得不到解決，將有可能加劇社會分裂和對立，影響社會穩定，嚴重地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為此，再分配機制的建設十分重要。

中國現在還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再分配機制。中國亟待構建有效的再分配機制，緩解正在擴大的收入差距和地區差距，從擴大消費的觀點來看來講，也需要消除人們對未來的不安。

為此，必須摒棄為二元社會結構所束縛的思維模式，構建以全民為對象的義務教育、醫療保險、養老金等國民最低保障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4· 改革財政機制

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動力是地區間競爭。但是在以利用世界資源和參與國際大分工為前提的發展模式下，有深水港的地區和遠離深水港的地區之間在發展條件上存在着天然的差異，這種差異是造成中國地區間不均衡發展的根本原因。無視發展條件差異的地區間競爭擴大了地區間社會經濟發展的差距，更嚴重的是，缺乏發展條件的地區，盲目追求發展的現象愈演愈烈。無視發展條件制約的盲目追求所帶來的低水平、重複建設和重複投資造成了大規模的資金浪費、土地浪費、人力浪費和生態環境破壞，使本來就緊缺的地方財政入不敷出。地方財政的窘迫導致地方政府向土地要財政，向收費要財政的傾向越來越嚴重。這種地方財政對所謂「第二財政」和「第三財政」的依賴造成了

嚴重的土地問題和亂收費問題，引發了深刻的社會矛盾，嚴重地威脅着中國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

在三大城市群的高速發展和內陸部分地區產業活力欠缺的兩極分化現象已經鮮明的今天，需要認真地對待地區間競爭所造成的結構問題。中國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需要跳出地區間競爭的發展模式，中國需要在持續發展大城市群、大城市的同時，緩解內陸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壓力。

為了緩解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壓力，必須改革由地方政府為主負擔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建設的現行體制，提高中央財政在這些領域的投入。通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施行大規模財政轉移，保證地方行政財權和事權的統一，實現一定力度的地區間再分配，促進欠發達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確保社會保障的落實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為此，需要對財政機制進行徹底改革。

5·再造農村社會

今天，中國正在發展的道路上高歌猛進，但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卻仍然徘徊在農村和城市之間，無法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就業和居住權益、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同時，大量勞動力的流出也徹底破壞了傳統農村社會結構，農村社會的空洞化發展迅猛，不可逆轉。商品經濟的滲透更使自給自足的小規模農業難以為繼，中國的農業生產也進入了需要追求規模經濟效益的時代。

中國農村的出路在於將三農問題放到城市化進程中來思考，改革戶籍制度，構建城鄉間相對公平、覆蓋全民的醫療社會保障體制和公共服務體系，從根本上變革二元化社會結構。同時，與城市化、大城市群化相連動，中國農村社會的重建時不可待。需要通過實施村落合併、鄉鎮合併、土地制度改革、農村行政服務體制建設等一系列舉措，實現以人口向城市轉移為前提的農村社會重建。

6·建立有效的制約機制

中國激烈的地區間競爭是在缺乏有效制約機制的情況下展開的。在追求經濟發展的熱潮中，促進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激勵機制巨大，相反，制衡發展的機制欠缺。沒有有效制約機制的地區間競爭釀成了許多深刻的問題。

以土地問題為例，地方政府通過對土地資源的流轉和開發不僅可以獲得「第三財政」收入，同時提供廉價的土地也是現今招商引資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為了招商引資，正在無節制地進行大規模土地開發。這種現象在中國造成了一方面耕地資源非常珍貴，另一方面土地利用效率卻極其低下的矛盾局面。

此外由於對政府的土地徵用行為缺乏強有力的制約機制，在低水平規劃的指導下，城市化正在對舊城區和珍貴歷史文物建築進行粗暴地摧毀，大量有歷史文化價值的舊建築、舊街道、舊城鎮被野蠻地破壞。雷同、呆板、缺乏個性、忽視自然、抹煞歷史的城鎮在全國各地大量複製。這種摧毀和低水平複製所造成的損害規模之大、速度之快史無前例。

中國需要建立一套制約亂開發、低開發的有效機制。

地區間競爭在帶來了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引發了地區差距的擴大、無序開發的氾濫、農民權益的損害等深刻的社會經濟問題，這些問題正在動搖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中國亟待形成超越地區間競爭的發展模式，為此必須果敢地實行財政行政體制的改革，構建再分配機制，建立對無序開發的有效制約機制。

7·大城市群的持續發展

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發揮引擎的作用，需要依靠大城市群的持續發展帶動中國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化解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矛盾和問題。因此大城市群的發展左右着中國的未來。然而

大城市群持續發展本身是一場極其艱難的挑戰。

中國的三大城市群是信息革命下全球供應鏈的擴張與改革開放相互作用的產物。中國的經濟和人口將越來越向三大城市群集中，三大城市群將成長為對世界經濟產生巨大影響的空間。這一人類史上從未經歷過的大規模、高密度城市空間的健康發展需要明確的大城市群政策的支持。

產業和人口向三大城市群集中的趨勢，無疑將導致在這些地區形成大規模、高密度的城市空間。高度的集聚效應是大城市、大城市群發展的原動力，但是集聚的負面效應也已經在中國的大城市日漸突出，慢性的交通堵塞、長時間通勤的常態化、居住環境的低劣、熱島效應等大城市病日益嚴峻。

大規模的人口移動今天還剛剛拉開帷幕。在今後的二三十年，農村勞動力還將源源不斷地進入城市，這意味着中國面臨着構建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高密度城市社會的挑戰。

8· 促進內陸地區城市群的發展

中國的城市化，特別是大城市的發展已經波及到了內陸地區。以內陸的省會為中心，近年來大城市的發展較迅猛。內陸地區的經濟和人口越來越向大城市集中和集聚。大城市正在成為支撐內陸地區發展的據點。隨着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在發展條件較好的地區，相鄰的大城市和周邊中小城市的分工合作正在深化，逐漸形成城市群形態的集聚空間。城市群將成為支撐內陸地區發展的核心。

因此，建設大規模高密度的城市社會，同樣也是內陸地區大城市，以及大城市群的挑戰。

中國經濟發展在空間上需要延伸到內陸地區，內陸地區新發展極的形成對中國的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至關重要。因此在充分考慮內陸地區制約條件的前提下，如何發展內陸大城市、城市群，應該成為中國未來需要重視的一大政

策目標。

9·營養和保護企業家精神

在營造創新和創業的環境上，政府的責任和作用重大。政府需要開放國門、指示方向、打破壟斷、提供基礎研究的資金和環境……但是一定要竭力避免政府對產業的直接保護。從各國產業政策的歷史看，大凡政府極力保護的產業最終都不盡人意。美國汽車產業曾經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致使汽車巨頭對華府過分依賴，怠慢變革，最後以破產收場。日本半導體產業也是在政府的扶持下一路滑坡，從全球過半的霸主跌落到要向台灣乞討、政府援助的困境。相反，日本動漫卻在沒有任何政府支持下發展成為一大出口產業。

如何營養和保護寶貴的創業精神，如何給企業更多的創業空間和更好的創業環境是持續發展的關鍵。

10·共創東亞新時代

1960年代以來，東亞一直是全球經濟最富有活力的區域。1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將日本打造成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四小龍」的橫空出世第一次向世人展現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實現工業化的先例；中國長達30年的發展奇跡更是給世界經濟注入了巨大活力。兩次石油危機、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日本的泡沫經濟破滅以及亞洲金融危機，雖然分別使一部分的東亞國家經濟曾經一度陷入停滯，但是各國最終都從停滯中跳出，重新回到成長的軌道。東亞在全球GDP中所佔的份額從1965年的8.9%持續上升至2008年的20.4%，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引領下的該地區，今天是最富成長性的新天地。

東亞各國的發展並不是孤立的發展，而是建立在相互分工合作基礎之上的發展，區域內貿易率從1980年的34%一路攀升到2005年的56%，把整個東亞看成「世界工場」可能會是更加貼切的比喻。但是東亞的區域內合作機制建設還

遠遠落後於時代的要求。雖然在「10+3」（東盟10國+中、日、韓）對話機制上有一定的進展，但是在整個區域內還沒有建立起支撐大交流、大分工時代的制度保障，至今沒有涵蓋整個地區的自由貿易協定、金融合作機制、投資協定、環境—能源合作機制，更沒有真正開始探討東亞共同體未來的前景。

特別是域內人員往來遠遠落後於時代的要求。缺乏區域內人員跨國自由往來的機制，嚴重制約了東亞大交流、大分工經濟的發展。實現區域內物流和人員往來的準國內化是東亞下一輪大發展不可或缺的條件。

經濟、環境全球性課題的凸顯要求超國家機制的應對。2009年12月1日《里斯本條約》生效，歐盟誕生了第一任「總統」（歐盟理事會常任主席）和「外長」（歐盟負責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級代表），人類超國家性區域機制的嘗試又向前邁進一步。

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中國與東盟步入零關稅時代，標誌着中國跨出了營建區域共同體的第一步。

全球經濟危機無疑給東亞帶來重大轉折，迫使各國重新定位國家與國家的關係、國家與市場的關係、國家與產業的關係、國家與個人的關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東亞各國需要攜手營建經濟共同體，共創東亞新時代。

順應時代的要求是成長與變化中的新時代締造繁榮的真諦。在IT革命、低碳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中，中國只有以更進一步的改革開放搏擊宇內、爭流萬邦，才能實現真正的崛起。

本書的作者們通過多年交流和探討，在對中國今天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取得了共識的基礎上，各自撰寫熟悉領域的章節集結成書，旨在剖析中國社會經濟面臨的結構性問題，探討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探求社會結構的變革，為改革提供政策性的思考和建議。

本書的許多作者任職於政府政策部門，但其觀點不代表所在部門的立場。